

2-37

贵州计划经济

5

1990

GUI ZHOU
JI HUA JING JI

目 录

贵州省一九九〇年上半年国民经济

计划执行情况……………姚继元 (1)

· 治 理 整 顿 ·

围绕治理整顿 更好地深化改革

……………周 荧 (5)

· 宏观经济研讨 ·

论增加贵州总供给……………蒋应铨 (12)

一九八九年货币流通分析及建立

货币调控总机制的设想……………王惠英 (15)

· 工 作 研 究 ·

关于香港经济的发展趋向和对发

展内地落后地区经济的思考

(一)……………张文舟 (18)

贵州特色的县级信息系统建设刍议

……………甘 露 (21)

结合省情 改革招生办法……………陈 勇 (23)

检查机关保护和扶持民族地区乡

镇企业的体会……………熊志坚 (24)

· 地 县 经 济 ·

“以物放贷 以粮还贷 配套服
务”促进农业综合服务体系

的形成和发展……………郑荣华 石沙米 (27)

铜仁地区农民收入现状与前景的

思考……………刘承党 (31)

建立完善的综合服务体系 促进

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绥阳县综合服务领导小组 (34)

普定县经济起步的途径及其启示

……………周邦杰 (39)

主办单位：贵州省计委
计划经济研究所

主 编：周邦华

副主编：扈 伦 张文舟 (常务)

印 刷：贵州商业专科学校印刷厂

地 址：贵阳市延安中路

电 话：24770

期刊代号：贵州省报刊登记证

黔刊内字第01—K16号

F127.9

2-C

贵州省一九九〇年上半年国民经济

计划执行情况

姚继元

今年上半年，我省继续贯彻治理整顿的方针，从年初开始就抓紧生产准备工作，采取了各种措施防止工农业生产滑坡，在资金投放、能源供应和铁路运输以及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等方面做了较多的工作，使国民经济半年来一直保持了稳定发展势头。目前夏季粮油喜获丰收，工业生产形势稳中向好，市场和物价平稳，财政收支均衡，信贷状况好转，职工生活继续得到改善。总的经济形势正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1、农业生产形势好于往年。今年以来，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普遍加强了对农业的领导，认真总结推广了农业实用技术，各项支农措施抓得早，抓得扎实，致使夏粮产量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据省统计局抽样调查，全省夏粮产量预计达到135.4万吨，为年计划的123%，比上年增产40.4万吨，增长42.5%；油菜籽产量达43.5万吨，超年计划8.8%，比上年增产14.16万吨，增长48.3%。秋粮播种和长势也较好。

今年农业生产形势较好的主要原因：一是气候条件较好。二是农业投入增加。1—6月份，全省支农资金支出0.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1%；农林水利事业费1.17亿元，增长11.4%；银行发放农业贷款余额达到12.46亿元，比年初增加1.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亿元。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也有明显改善。三是春播工作抓得扎实，进展顺利，播种面积增加。到6月底止，全省水稻栽插面积1103.5万亩，为年计划的101.9%，比去年同期增长0.5%；其中杂交水稻栽插面积706.2万亩，增长44.6%；已种植包谷1004万亩，为年计划的

102.5%，增长11.8%，其中种植杂交包谷412.1万亩，增长18.6%；烤烟种植326.6万亩，超过年计划30.6%。四是各地区普遍推广了农业实用技术。施行育苗移栽包谷、水稻薄膜育秧、水稻规范化栽培和中层施肥等措施都比去年有较大进展。五是狠抓兴修水利取得了成效。去冬以来，全省广大农民投劳达1.2亿个工日，比去年同期增加3000多万个工日，新增、改善灌溉面积66.6万亩，比去年同期有较大增长。六是畜牧业发展势头较好，生猪存栏上升5.2%；林业造林面积已完成370万亩，增长15.3%；乡镇企业稳步增长，完成产值19.2亿元，增长11%。下半年如不出现特大灾害，今年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可望超额完成计划。

2、工业生产平稳增长，但速度低于计划要求。今年上半年，全省工业生产尽管遇到市场销售疲软、资金短缺等困难，但仍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呈逐渐向好趋势。1—6月，全省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65.35亿元，为年计划的45.4%，比去年同期增长4.5%，高于全国增长2.2%的水平，但低于计划增长6%的要求。其中：乡以上工业总产值为57.6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8%。在列入重点检查的83种主要产品中，比上年同期增长的有49种，占59%，上升幅度较大的有合成氨、呢绒、酒、钢、铁合金、机焦、电石等；下降的34种，占41%，主要有电冰箱、洗衣机、彩电、皮鞋、机床、汽车、挖掘机等。

上半年工业生产中的几个特点是：
（1）增长速度逐月上升。全省乡以上工业总产值1—6月增长速度依次为1.1%、

18.2%、0.2%、2.6%、2.1%，到6月份达到4.3%，完成月产值11.21亿元，形势向好。但各地区、各部门发展不平衡。

(2) 重工业增长快于轻工业，地方企业快于中央企业，集体企业快于全民企业。1—6月，轻工业总产值完成23.81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重工业产值完成33.83亿元，增长5.7%，重工业增长速度高于轻工业4.6个百分点；集体企业增长速度为9.7%；全民企业增长速度仅为1.9%，集体企业增长速度高于全民企业7.8个百分点。中央企业下降4%（主要是军工企业下降较多），地方企业中省属企业上升增长11.6%，地县及以下企业上升增长4.5%。

(3) 能源、原材料及主要支农工业产品持续增长。与去年同期相比，原煤增长13.3%，发电量增长11.4%，焦炭增长15.6%，钢增长23.7%，铁合金增长24.9%，氧化铝增长10.9%，磷矿石生产量增长25.7%。支农产品中的化肥增长8.3%，化学农药增长11.6%。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布、毛线、服装、乳制品等产品的生产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势头。

(4) 铁路运输增长较多，公路运输下降。1—6月份铁路货物发送量完成952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8.8%，装车数增长7.5%。磷矿石和统配原煤运出量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56.6%和7%。汽车货运量受运价高、任务不足的影响，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5%。

3、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继续得到控制，投资结构有所调整。在去年清理在建项目、压缩投资规模的基础上，今年计划安排上，注意了保重点建设项目、生产性建设项目。1—6月份，全省全民所有制单位预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7%，其中地方投资4.76亿元，为年初计划的37.9%，增长2.3%。1—5月，地方基本建设项目完成投资1.72亿元，为年初计划的40.5%，增长6.1%；其中：生产性建设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13.7%，非生产性建设投资下降2.2%。地方更改项目完成投资1.57亿元，为年初计划的

20.6%，下降3.9%。

4、市场销售缓慢复苏，物价涨幅明显回落。今年以来，市场销售比较平稳，进入五月以后，市场开始缓慢回升，扭转了负增长的局面。1—6月份，全省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完成46.0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0.1%，其中对居民的零售额36.48亿元，下降2.4%；社会集团零售额3.49亿元，上升0.2%；农业生产资料零售额6.06亿元，增长18.2%。据对28种商品统计，全省社会商业销售比上年同期下降的有24种，占87.5%；其中棉布、呢绒、针织内衣裤、各种服装、绸缎降幅均在38%以上；上升的仅有4种，占14.3%。

1—5月份全省零售物价指数比上年同期上升1.8%，上涨幅度大大低于上年同期的31.2%的水平。其中，城镇下降0.8%，农村上升4.5%。1—5月城镇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上升0.2%。

5、外贸出口继续增长。上半年全省外贸出口预计完成0.78亿美元，为年计划的57.8%，比上年同期增长23.5%，实现了时间过半完成任务过半的要求。出口收购完成较好，已完成3.5亿元，为计划的42.6%，增长14%。进口用汇完成2600万美元，为计划的35.6%，增长14%，其中，工业原料进口占40%，支农产品进口占15%，新技术成套设备及机电产品进口占27%，为我省生产建设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6、财政收支均衡，信贷状况好转。1—6月份全省财政收入累计完成13.36亿元，为年度预算的39.3%，比上年同期增长51.3%，增收4.5亿元；全省财政支出累计完成16.6亿元，为年度预算的40.5%，增长15.2%。

6月末，全省银行各项存款总额118.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0.7%。全省银行各项贷款总额148.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全省货币净投放4.42亿元，比去年同期多投放2.62亿元，增长57.9%。

总的来看，我省今年1—6月国民经济的发展比较平稳，但是，各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仍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疲软。1—6月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扣除物价因素，实际比去年同期仍略有下降，主要是受去年同期基数较高，紧缩政策起到了抑制消费的作用，物价上涨幅度回落过快，压缩基建规模和购买力往储蓄分流，以及适销对路商品短缺等的影响。从具体商品的购销情况来看，穿的商品和部分日用工业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销路不畅，1—5月份，国营商业经营的36种主要吃、穿、用商品中有29种销售比去年同期下降，占80.6%。但是到今年5月底，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达50.8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高达31.3%。从生产资料供应的情况来看，总量比较充裕，但是结构、品种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矛盾，对销售也有一定的影响。到目前市场虽然有复苏，但仍没有大的好转。

2、企业资金仍然偏紧，库存大幅度增加，严重影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去年末以来，虽然各级银行都增加了对工商企业贷款，但是资金紧张的矛盾没有从根本上缓解，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三角债”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清理“三角债”涉及面广，而且省外欠我省的大于我省欠外省的，清欠工作困难，全省目前约有23亿元的相互拖欠，据调查，仅贵阳市属工业企业被外地企业拖欠的资金就达3.2亿元左右，而贵阳市属企业欠外地企业只2.2亿元。由于大量资金被拖欠和沉淀下来，使企业的资金周转产生困难。另一方面，由于产品结构仍不尽合理，市场疲软、投资需求下降等原因，工商企业的库存和积压都大幅度增加，到5月末，国营和合作商业企业库存总值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5.9%。主要是部分耐用消费品、机电产品和其他投资类产品积压库存较严重。仅系统内的机械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已达2.8亿元；一些骨干工业产品如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挖掘机、金属切削机床、水泥等的库存都比去年增加1/3以上。产成品资金占用规模过大，影响了企业的正常周转和经济效益，成为企业的严重包袱。

3、产品结构调整还需加快步伐，商品销售有待加强。虽然我省产品结构调整取得了一

定成效，但是我们对治理整顿时期如何加快产品结构的调整办法还不多，使生产发展受到影响。同时国营商业的主渠道、蓄水池作用近年来没有很好发挥，商业企业、工商企业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产品的推销、促销工作不够得力，也加重了当前企业的困难。

4、经济效益持续下降。今年以来，虽然强调了要改变去年下半年以来经济效益下降的局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至今收效不大。1—6月，全省地方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完成的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1.5%，销售收入却下降5.5%，实现利税下降26.4%，资金占用额上升26.1%，其中，产成品资金上升了37.5%，亏损企业增加100户，占43.2%；亏损总额达到5187万元，增长125.7%。可比产品成本上升6.24%。如不能尽快扭转这种局面，势必影响今年的财政收入和职工生活水平的提高。

5、出口创汇成本提高，外贸企业经营性亏损继续上升。今年上半年外贸进出口完成计划较好，但换汇成本5月份达到6.11元/美元，比去年平均的5.68元/美元增加7.6%。外贸出口大量超亏，到5月底全年的国家出口亏损补贴实际已用去80%，同时，调剂外汇困难，难以实现补亏和补充流动资金的作用，加剧了外贸企业收购资金的紧张程度。

6、企业安全生产状况不理想，人身伤亡和设备事故较多。由于及时采取了有效措施，加强了领导，五、六月份明显好转。

尽管当前我省经济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但是，全国和我省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和有利条件也很多，随着各项措施的落实，有的矛盾初步得到缓解，有的正在缓解，生产资料出现动销趋势，市场销售开始缓慢回升，煤、电、运、汽油平衡情况好于往年等，只要我们认真根据李鹏同志在国务院第九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和最近省委扩大会议精神，振奋精神，协同配合，狠抓落实，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任务还是可能的。为此，下半年我们准备要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进一步在治理整顿中深化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前进，才会有发展。解决当前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和困难的根本途径，就在于做好深化改革这篇文章。为此，企业承包应在总结上一轮承包的基础上，分别不同企业，核定各项指标，尽快做好新一轮的承包工作，以调动经营者和职工的积极性；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企业的改组、联合、试行股份制；进一步理顺工商企业之间、部门之间、企业之间、金融企业与工商企业之间的关系，协同配合，争取经济的协调发展；吸引省外和国外资金，加强技术经济协作；推动增产促销工作的有关政策措施和优惠条件等等，都需要以改革的精神，不断探索前进，不能被动等待，耽误时机。

第二、各方协力，做好工作，争取农业全面丰收。今年夏季粮油喜获丰收，尤其是夏粮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但不能因此盲目乐观和产生松劲情绪，要正确估计农业生产面临的形势和困难，狠抓农业生产。一是各级各部门要加强对农业生产的组织和领导工作，抓好农作物的管理，及早安排好秋种工作，为农业生产创造良好的条件。二是要立足抗灾夺丰收。针对今年以来农业上灾情较多的实际情况，抓紧抓好防灾抗灾工作，特别是当前一些地区已经发生的病虫害和七、八月份可能发生的伏旱，要抓紧救治和预防，积极落实各项措施，防止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大的影响。三是要加强农业服务体系建设。要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地逐步建立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服务体系，特别是积极安排好粮油加工，搞好农业产后报务。四是要坚持抓好科技兴农，当前要继续抓好各种示范工程，强化经济技术部门为农业服务的功能。五是继续抓好农田基本建设，力争投入不低于去年并有所增加；六是积极搞活农村流通，改善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办法，认真执行农产品保护价，以保护和提高农民种粮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第三、要大力开展“双增双节”运动，切实抓紧产品结构调整，促使工业生产在不断提

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产品结构调整，首先要根据市场需要，实行分类指导，帮助企业确定产品结构调整的方向。其次，产品结构调整主要要靠企业来进行，要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三是要采取有效的鼓励政策，并积极帮助企业克服外部制约因素的影响，把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提高经济效益的内在要求和外部动力结合起来，使产品结构调整的进程逐步加快。同时要千方百计降低消耗，降低成本，增强产品的竞争能力，提高经济效益。

第四、要强化销售工作，搞活流通，启动市场。必须充分发挥国营商业、物资部门的流通主渠道作用，在当前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要改进服务方式，采取多种办法，扩大销售门路，搞活商品流通。工商企业和行业主管部门都要为产品谋出路，加强生产调度，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积极扩大农村市场，认真搞好工业品下乡工作，使广大农民能得到丰收的实惠；对强化销售工作中的一些政策的具体界限，如正常销售费用等要进一步予以明确；对工商企业积压、滞销产品要采取优惠政策进行一次性处理或举行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产品交易会，处理积压，搞活资金，搞活企业；要积极引导消费，对合理的消费应给予提倡和鼓励，减轻群众的心理顾虑，同时适当放宽若干省内产品的“社控”范围。要搞活生产资料市场（包括金属材料、水泥砖瓦、建筑队伍等），搞好品种调剂。搞活生产资料市场的关键在于适当放宽投入限制。只要是资金落实，审批手续完备，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基建、技改项目和公路建设、农房建设、城市商品房等，都可适当放开一点，以保持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少于去年实物量的水平。

第五、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企业素质。要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改善和加强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克服畏难情绪，振奋精神，加强企业管理，搞好安全生产，为完成今年各项计划任务而努力工作。

围绕治理整顿 更好地深化改革

周 芑

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的两项主要任务，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搞好治理整顿，才能为深化改革创造适宜的 经济 环境，促进改革的健康发展；而治理整顿，又需要深化改革的配合，通过深化改革来促进治理整顿任务的顺利完成。党的五中全会《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中指出：“在集中力量进行治理整顿期间，改革要围绕治理整顿来进行，并为它服务。”为此，改革要与治理整顿相结合，适应治理整顿的需要，在保持改革措施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前提下，对各项改革措施要作具体分析，有利于治理整顿的改革要坚持，要深化、补充和提高；不完善的要加以完善；不适应治理整顿要求的，要作必要的调整。有些从长远看是必须的，但同当前治理整顿有矛盾的改革，要放慢步子或推迟出台。

改革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城乡人民生活明显改善。1979—1988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6%，超过1953—1978年平均年递增6.1%的速度。这十年间，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年递增11.8%和6.5%。实践证明，改革从总体上来讲，是成功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改革毕竟是项艰巨复杂的任务，是件开创性的工作，难度很大，缺乏经验，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为了使改革在促进经济发展和治理整顿中更好地发挥作用，认真总结改革的经验是十分必要的。

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深化改革，最关键的是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要改革，首先要弄清楚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要改革？二是进行什么性质的改革，即朝着什么方向进行改革？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可使我们正确理解这两个问题。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个基本点”是为“一个中心”服务的，是实行“一个中心”的基本保证。在现阶段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了逐步解决这个矛盾，就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以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服从这个中心，服务于这个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为了保证现代化事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坚持改革开放则是为了加快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步伐。社会主义是个崭新的社会制度，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总体上来看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来予以解决。社会主义改革就是要根据社会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和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调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

济体制，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是手段，发展是目的，改革要为发展服务，改革的得失成败主要以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来检验；哪些要改，哪些不改，哪些先改，哪些后改，也要以此为准。因循守旧，不思变革，就会窒息社会主义内在的活力和生机，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

“两个基本点”是有机的统一体。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明确规定了改革开放的性质和方向，是改革开放的前提和基础。改革开放是基本方针和基本国策，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而绝不能同四项基本原则相割裂、相背离、相对立，否则就会走偏方向，搞资本主义化。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就是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子，背离四项基本原则，妄图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改革开放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这样，势必使解放了的中国人民重新遭受深重的灾难，沦为外国资本和本国剥削阶级的双重奴隶。所以改革偏离社会主义方向是十分危险的。是否真正拥护改革，不能只看举不举改革的旗帜，更要看所主张的改革方向对不对。要特别警惕以改革为幌子，干反对社会主义的勾当。

江泽民总书记在国庆四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提醒我们：“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我们必须明确划清两者的根本界限”；并明确指出：“当前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尖锐对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改革开放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个问题上”。

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主要要坚持三点：

一是在所有制结构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基本原则，所有制形式的选择，要同生产力的状况相适应，要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过去片面认为越大越公越纯就越是社会主义，脱离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搞“穷过渡”，严重影响了生产力的

发展。改革中从我国现阶段生产发展水平比较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方针，适当调整了所有制结构。1988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占56.6%，集体所有制占36.4%，其它经济成分占7%；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分别占39.5%、34.4%和26.1%。公有制仍占绝对优势，发挥着主导作用，又适当发展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和外资企业等，发挥其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作用。实践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坚持这个方针，绝不是要削弱或取消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更不是要实行经济“私有化”。但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却大肆鼓吹“私有化”。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如果改革中推行“私有化”方针，以私有制来动摇、排斥、取代公有制，则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被颠覆了，还谈得上什么社会主义方向？这样的改革就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是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化。所以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绝不能动摇，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则应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的，必要的补充而存在。在经济政策上应支持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发展，而不应向私营和个体经济等“倾斜”，对它们既要使其有个适度的发展，又要加强管理和引导，发挥其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作用。

二是在分配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这是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相适应的。因为分配结构是决定于生产结构的。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在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在分配上也就应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同时既然允许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也就必然会有非按劳分配的收入，但应明确这种分配方式只能作为补充。正确贯彻这一方针，一要克服平均主义；二要防止收入过分悬殊。搞平均主义，干多干少、干好

干与不干一个样，势必影响广大群众的劳动积极性，败坏社会风气，危害社会主义事业。长期以来，我们受“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影响较深，平均主义曾是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一个严重障碍，迄今尚未完全克服。诚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的，是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消灭贫穷，保证全体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走向共同富裕，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平均和同步富裕。所以，提倡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裕起来。这个政策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执行中出现了收入过分悬殊为特征的社会分配不公，特别是广大靠工资收入的职工、干部、知识分子同私营企业主、部分个体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引起劳动群众的不满，必须认真解决。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则在宣扬“私有化”的同时，否定“按劳分配”，鼓吹“按资分配”，否认私营企业存在剥削。如果按照他们的主张去做，就不是走向共同富裕，而是进一步扩大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列宁指出：“亿万富翁无论同什么人瓜分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收入’，都只能‘按资本多寡’，而不能有其他什么标准……。资本主义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这种基础上鼓吹‘公平’分配收入，便是蒲鲁东主义，便是市侩和庸人的痴想。”（《列宁全集》第21卷，第320页）分配关系反映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改革中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还是搞“按资分配”也直接关系到改革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还是搞资本主义化。

三、在经济管理制度上坚持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不存在商品和货币关系条件下的计划经济，那是以生产力高度发展，生产过程高度社会化，已经历过商品经济相当发达阶段为前提的。我国现阶段还不具备这些条件，还要通过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广泛发展，不可避免会

产生一定的盲目性，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我们可以在总体上自觉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所以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和在总体上有计划发展的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以私有制为基础和在总体上由市场自发调节的商品经济是有本质区别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显然，计划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制度，而市场经济则属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做计划时，就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考虑市场供求关系，重视发挥价格、税收、信贷等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以保证计划的实现。在实行计划调节的同时，要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以增强企业活力，促使企业提高效率，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要。计划经济中注意恰当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并不等于实行市场经济。计划调节与计划经济、市场调节与市场经济，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制度，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则是现阶段我国经济运行的相辅相成的两个调节机制，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互相排斥，而应有机的结合起来。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把计划调节绝对化了，计划统得过多，管得过死，忽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不利于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把经济管死了，这种经济管理体制必须改革。但是，近几年来，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却又片面夸大市场机制的作用，宣扬“市场万能论”，否定计划调节的作用，鼓吹以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这就不仅会把经济搞乱，而且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实行市场经济势必要改变公有制，断送社会主义。所以，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要逐步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既不能以计划排斥市场，跳不出旧体制的框框，更不能以市场排斥计划，滑入

市场经济的泥坑。当然，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程度、方式和范围，要经常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改进。在当前治理整顿时期，就要更多地发挥计划的调节作用。计划调节，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对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经济活动国家要通过指令性计划进行直接管理；对实行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那部分经济活动，国家主要通过经济政策、经济杠杆，以及法律、纪律和政治思想工作等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间接管理，使之符合国家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做到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

总之，在改革中坚持做到以上三点，也就能保证改革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

深化改革中要实现五个转变

在坚持改革正确方向的前提下，还必须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进一步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的道路。为了使改革更好地适应治理整顿的需要，针对改革中的问题，初步考虑，在深化改革中要实现以下几个方面

的转变：

- 1、在改革的指导思想上，要从急于求成转变为从实际出发，稳步前进。

改革是一场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任务十分艰巨、复杂，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能完成。具体来说：（1）改革既要调整生产关系中各种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又要培育和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体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2）改革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有些改革措施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因而十分复杂；（3）改革直接触及各方面利益的再分配，势必会引起各种利益关系的摩擦和矛盾，遇到一些阻力；（4）改革要破除传统观念，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理论体系作指导，而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经济理论的发展需要有个过程；（5）这次改革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而前几次改革都只限于调整中央和地方、条条和块块的管理权限，因此需要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实践中进一

步探索改革中一些规律性的问题，这是要花力气的。前几年由于对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改革中存在急于求成的偏向，结果是欲速不达。

改革中急于求成，首先表现在目标定得过高、过急。1985年在“七五”计划建议中要求，“七五”期间，“争取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以后“七五”计划虽把实现这个目标的时间规定为“力争在五年或更长一些的时间内来完成”，仍然是脱离实际可能的。为了实际这个目标，往往不顾主客观条件，急于在改革上迈大步。这几年正是由于在改革和发展上的步子都迈得过大，经济发展中出现了社会供求总量失衡、结构失调、通货膨胀、经济秩序混乱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改革和发展的顺利进行。同时，在

一项改革措施尚未达到预期目标的时候，往往又急急忙忙推出新的改革措施，而且往往未经试点，就一哄而起，不重视综合配套，也缺乏周密考虑，致使不少改革措施需要进一步完善。

改革中急于求成也与受一些理论观点的影响分不开。例如，关于改革的环境问题，改革之初，一般都认为需要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使价格等经济杠杆和市场竞争机制得以逐步正常发挥作用，并有一定的财力、物力后来支持改革。1984年经济过热以来，有的人则认为改革只能在紧张的环境中进行，只有加快改革才能创造出宽松的经济环境。受这种观点的影响，在1988年通货膨胀明显加剧的情况下，还放开和调整了一些商品的价格，并准备搞价格“闯关”，以致出现挤兑抢购风潮，被迫推迟价格改造的进程。实践证明，在供求紧张的环境中，改革难以顺利推进。当前进行的治理整顿正是为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值得研究的是，当前经济环境相对趋于宽松，从总体上说，是否出现了加大改革分量的良好时机？我认为，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不稳定因素虽然有所缓解，但并未根本消除，总需求大于

总供给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有些同志认为总量紧缩已经“到位”的估计未免过于乐观；产业结构失调、经济效益差等深层次问题远未解决，又出现了市场销售疲软、工业增长速度回落过猛、停产半停产企业增加等新的矛盾和问题，在这种依然严峻的经济形势下，改革不能不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如果又急急忙忙加快改革步伐，要考虑会不会重蹈过去的“覆辙”？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加大改革分量？如果说重点是针对原有改革措施中的薄弱部分加以补充和提高，不完善的加以完善，如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深化企业改革等，以利于控制总量、调整结构、提高效益，又不致引起社会的震荡，那正是深化改革的问题。如果加大改革分量，意味着当前要加快出台一些新的改革措施，特别是涉及面广、影响大的改革，那就要持慎重态度，进行周密考虑。总之，改革步子的大小，改革措施的选择，都要谨慎从事，使之有利于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切忌急躁，以免发生失误，导致治理整顿前功尽弃。

又如，关于新旧体制的转换问题。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是：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经济生活中必然产生很多矛盾、摩擦、漏洞和“真空”，因此要加快推进改革，尽快渡过新旧体制胶着对峙的难关；而且不加分析地把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一律归咎于旧体制。我认为，改革既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社会主义制度又需要在不断完善中发展，逐步臻于成熟，因而新旧体制的转移就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突击完成。而且改革只是要革除旧体制中某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东西，不能全盘予以否定，新旧体制不是完全对立的。如果每项改革措施在破“旧”的同时立“新”的，也不一定会产生什么“真空”。至于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问题要作实事求是的分析，从体制上来说，有些是由于旧体制的毛病，有些则是改革措施考虑不周或只“破”不“立”等原因造成的，一律归咎于旧体制，不符合实际，也无助于总结改革经验，改进工

作。有的同志还提出，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要敢担风险，大胆闯关。要改革，是会有些风险的，但一项改革措施出台以前，应作周密规划，谨慎从事，一个11亿人口的大国，经济上要力争搞得稳当一些。不顾条件，盲目闯关，没有不碰壁的。至于在改革进程中，有时步子迈得大了一些，作些调整，也是必要的，暂时的退是为了以后更好地进，不能认为不进则退，不能动不动就斥之为旧体制复归。如果有些改革措施不当，不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更有必要及时予以纠正。以上种种改革“速成论”，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纠正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澄清种种糊涂观念，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分析经济形势，积极、稳步地推进改革。新的重大改革措施要经过试点，实践证明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后再推广，不要一哄而起。

2、改革的主要做法上，要从单纯放权让利转变为适当加强集中。

正确处理集中与分散的关系，是搞好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国家集中过多，管得过死，不利于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而过于分散，特别是国家不掌握足以驾驭国民经济全局的财力、物力，也不利于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的管理。原有的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主要弊端是，国家集权过多，统得过死，如财政统收统支，物资统一调拨，商品统销包销，物价统一规定，劳动力统一分配，而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却缺乏必要的经营自主权，从而使企业缺乏应有的活力，不能充分发挥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企业是生产、建设和商品流通的主要的直接承担者，要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首先要使企业有充分的活力。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

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为了克服原有体制过分集中的弊端，有效地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适当放权让利是必要的，关键是要掌握适当的“度”。前几年的改革就是从放权让利着手的。对企业，在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的同时，通过实行利润留成制度、两步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以及租赁制等改革措施，向企业减税让利，使企业留利水平显著提高。1988年全国预算内国营企业的留利额由1978年的27.5亿元增加到700.6亿元，增加了24.5倍，留利率由1978年的3.7%提高到55.6%。财政方面，改革了中央对地方统收统支的预算体制，实行“分灶吃饭”，对各地方实行了不同形式的包干办法。外贸方面，打破了以国家统制为原则的外贸体制，全面推行了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物资方面，减少了国家对重要生产资料统一分配的品种、数量和范围，扩大了企业自销，活跃了生产资料市场。这些改革，一方面增强了经济活力，另一方面导致国家财力、物力过于分散。从财力来看，1988年预算外资金相当于预算资金的比例，由1978年的31%上升到91.2%；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则由1978年的37.2%下降到19.2%（按可比口径计算）。国家财政收入中，中央财政只占一半左右。外汇收入中，中央外汇只占40%左右。从物力来看，1989年国家指令性计划分配的物资比重已降到：煤炭只占45.2%，钢材42.6%，木材26.6%，水泥12.2%，目前，财力、物力统收的格局已打破，但统支、统配的格局尚未完全打破。这样，中央掌握的财力、物力与所承担的任务很不相称，收不抵支，捉襟见肘。如1979年—1988年，全国累计财政赤字648.1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达747.6亿元，而地方尚结余99.5亿元。这样，势必削弱中央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当前，为了搞好治理整顿，必须在发挥地方、企业正当积极性的基础上，适当加强集中。首先，全国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重大的调整措施要服从中央的统一指挥，做到令行禁止，不能各行其是。同时，在深化改革中，

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财政包干体制、外贸承包制和物资管理体制等，兴利除弊，总的要有助于适当提高中央财力、物力的集中程度，增强宏观调控的物质手段。特别是对企业，原则上不能再减税让利，而是要着力于完善企业经营机制，深化内部改革，挖掘企业自身的潜力来提高经济效益。1961年—1965年和1979年—1983年那两次经济调整的实践也证明，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战胜经济困难、胜利完成调整任务的一个重要保证。当然，仍要注意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不能回到集中过多的老路上去。

3、在改革的内容上，要从片面强调微观搞活转变为在继续搞活微观经济的同时，着重加强和完善宏观经济管理。

搞活微观经济和加强宏观经济管理是改革的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微观经济单位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搞活微观，才能使国民经济充满生机和活力，提高效率，为搞好宏观经济的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加强宏观经济管理，保持宏观经济的平衡，才能使微观经济单位的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活力得到正常发挥，是搞活微观经济的前提。两者之间是统一的，互为条件的。但又存在着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之间、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需要妥善处理，而在我国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条件下，是可以得到恰当解决的。在前几年的改革中，注意了微观搞活，但企业自我约束机制没有相应建立起来。企业较为普遍地存在短期行为，存在强烈的积累和消费的扩张冲动，一方面热衷于争投资、争贷款，另一方面在资金的使用上越来越多地向消费倾斜，按照政策规定，企业留利中60%应用于生产发展基金，用于福利和奖励基金的不得高于40%，1985年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这一比例为35.3：64.7，1987年降为18.8：81.2。特别是近几年在强调微观搞活的同时，放松了宏观经济管理，忽视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削弱了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加上宏观经济决策的某些失误，导致了宏观经济的失控，出现了积

累、消费“双膨胀”，国民收入超分配，这是近几年产生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实践证明，只有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实现宏观经济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协调，才能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如果片面强调微观放活，放权松绑，宏观经济管理跟不上，乃至失控，势必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微观放活的程度、范围和步骤必须同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相适应，并使微观经济活动符合宏观经济平衡的要求。在深化改革中，要在继续搞活微观经济的同时，着重加强和完善宏观经济管理，逐步建立起能够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宏观调节体系。主要是：（1）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真正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避免急于求成；（2）要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努力实现社会供求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协调，特别是要重视总量平衡；（3）国家对宏观经济要实行必要的直接管理，对微观经济可逐步实行以间接管理为主；（4）国家要掌握足以驾驭国民经济全局的财力、物力；（5）要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建立宏观调节体系；（6）要建立民主的、科学的宏观经济决策体系，保证决策的正确性。

4、在改革的部署上，要从“摸着石头过河”转变为制订中长期规划，分步实施。

鉴于经济体制改革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为了使改革顺利、健康发展，必须制订一个科学的中长期规划，分步实施。一是便于全国统一认识，步调一致地推动改革向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保证改革的成功，避免因改革方向不明，步调不一，影响改革的顺利进行，甚至走偏方向；二是便于改革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眼光不致局限于当前迈出的一步，避免改革中产生盲目性或短期行为；三是便于统盘考虑，进行综合配套改革，避免各项改革措施互不配套，甚至互相矛盾，造成混乱；四是便于近期计划与中长期规划相结合，保证中长期规划的实现，避免走一步，看一步，近期改革措施与中长期改革目标相违背。改革初期，由于缺乏经验，“摸着石头过河”，

还难以完全避免。但是多年以来，一味强调“规划难搞”，只作短期安排，不搞长远设想，改革措施往往单项突出，缺乏综合配套。结果，有的改革措施正负效应互相抵销，甚至发生“真空”、“错位”。如指令性计划范围缩小，指导性计划范围扩大后，经济杠杆的综合运用、经济监督、法制建设和信息反馈等工作未及时跟上，指导性计划起不了真正的指导作用，指令性计划又缺乏严肃性，导致计划失控。又如，农副产品和部分消费品价格放开，生产资料价格实行“双轨制”后，没有相应加强市场管理和法规建设，致使流通领域发生严重混乱。再如，这几年侧重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迄无大的突破，出现了某些“权力商品化”的错误倾向，等等。当前，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迫切需从我国国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设想的或搬用外国的某种脱离实际的模式出发，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搞出中长期规划，进一步明确具体的改革目标、改革的步骤、每个时期改革的重点及各项综合配套的改革措施等。改革已经摸索了十年，有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中央又作出了《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以统一全国的认识。在中央一系列正确方针、政策指引下，制订一个科学的中长期规划的条件已经成熟。当然，规划不可能订得十全十美，要在执行中根据实际情况加以修订，使之逐步臻于完善。

5、在改革的方法上，要从以“破”为主转变为“破立结合”，在“立”字上狠下功夫。经济体制改革，要“破”旧“立”新，是个破、立结合的过程。“不破不立”，不打破旧体制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就立不了新的。但是，“光破后立”或“破而不立”，形成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势必导致经济生活的混乱，所以应该是“不立不破”没有一定程度的“立”，就不能“破”，“立”比“破”更为重要，也更为困难。有的同志认为，“先立后破”，会推迟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甚至根本无法进行改革。事实上，每项改革措施的出

（下转第44页）

国民经济总量运动包含总供给与总需求两个基本方面的运动。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是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客观要求、是提高经济效益、保持

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必备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在缓解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中，深入研究贵州经济的现状，我认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不足。增加总供给是贵州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的需要，当前也提供了有利的时机，我们要抓住时机，作好增加总供给这篇大文章。

一、不是需求增长过旺，而是供给严重不足

(一) 不是需求过旺，首先对投资增长分析：据统计，从1985年至1988年，我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1981—1984年增长122.6%，平均每年增长18.5%。而同期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9%。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7.3%，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6.9%。这四年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都低于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稍高于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的增长。同全国对比，显然不是增长过快。全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984年为1,832.87亿元，1988年为4496.55亿元，增长145.3%，平均每年增长25.2%，全国投资增长率1986年18.7%，1987年20.5%，1988年18.5%，三年平均19.2%；同期贵州分别为8.6%、19.4%、5.7%，三年平均11.1%。这三年，不仅投资增长速度低于全国，而且实际完成的投资在全国投资总额中的比重还是逐年下降的：1985年占1.3%，1986年占1.19%，1987年占1.18%，1988年占1.03%。如以1985年的比例为基数，1986—1988年三年减少投资规模共达14.2亿元，平均每年减少4.7亿元。这种情况如不改变，势必严重影响贵州经济发展的后劲，进一步加剧贵州经济同全国的差距。

论增加贵州总供给

蒋应铨

其次，从消费需求增长分析。由于贵州经济不发达，农村人口多、贫困面大，消费水平低，消费增长速度均低于全国水平。

“六五”期间，全省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6%，是解放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时期。即使如此，仍低于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1.9%的4个百分点。“七五”以来增长呈下降趋势。同上年相比，1986年增长4.8%，1987年增长2%，1988年增长0.8%，三年平均增长2.5%，比同期国民收入年均增长8.2%低5.7个百分点。同全国对比，全国城乡居民货币收入1984年至1988年年均增长22.2%，超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988年成省城镇居民家庭生活费收入980元，只相于全国平均水平1126元的87%。如果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全省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与上年对比，1987年下降0.2%，1988年下降0.6%，1989年下降4.1%。贵州经济不发达，1989年贵州国民生产总值240亿元，全国15677亿元，只占全国的1.53%；当年贵州人口3171.2万人，全国111191万人，占全国的2.85%；当年贵州人均国民生产总值756元，全国1410元，占全国的53.6%。

(二) 供给产出不足。从农业、能源、原材料三个基础产业来分析：

贵州农业基础脆弱，存在“五低一恶化”的严重情况，即：人均产值低，人均粮食低，人均耕地低，单产低，商品率低和生态恶化。

农村人均纯收入，1980年贵州为161.46元，比全国191.33元少29.87元，低15.6%，居全国第22位；1985年贵州为287.83元，比全国397.6元少109.77元，低27.6%，居全国第28位；1988年贵州为397.7元，比全国545元少147.3元，低27%，居第28位。我省人均粮食占有量1949年为209公斤，1980年为233公斤，1985年为200公斤。1989年为223公斤比全国366公斤少143公斤。

人均耕地面积，1980年我省为1.04亩，比全国1.53亩少0.49亩，低32%；1985年我省为0.95亩，比全国1.4亩少0.45亩，低32%。单产低：以粮食作物平均亩产为例，1957年我省为136.5公斤，比全国的97.5公斤高39公斤；1980年我省为178.5公斤，比全国的182.5公斤少4公斤；1985年我省为179公斤，比全国的232公斤少53公斤。商品率低：1980年我省平均每一农村劳动力生产的现价社会总产值为472.5元，比全国869.6元少397.1元，低46%；1985年我省为859元，比全国1720.8元少861.8元，低50%。农副产品商品率，1980年我省是35.6%比全国的49.6%低14个百分点；1985年我省是36.8%比全国的53.9%低17.1个百分点。生态恶化：我省森林面积一再减少，森林覆盖率一再下降，受灾面积不断扩大。受覆面积“一五”期间为年均639.98万亩，“五五”期间为年均768.68万亩，“六五”期间为1970.4万亩，1986—1987年年均为2418.6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83.6%。

农业基础如此脆弱，除供应全省人民的粮食副食需要以外，还承担轻工业的发展，支撑财政收入。我省以食品工业为主的轻工业。对农业的依赖程度增加，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比重逐步上升，1984年为86.6%，1985年为88.1%。其中食品、饮料、烟草制造业又占整个轻工业产值的73%，而烟草就占70.7%，饮料占11.4%。我省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工商税和“两烟”（烤烟和卷烟）产品税。1988年全省工商税占财政收入的93%，其中“两烟”产品税收入为110,338万元，占当年工商税收入的45.73%。当前，我省农业已支撑不了人民生活，工业发展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不改变这种局面就谈不上贵州经济的发展。

从贵州能源供给分析看，1949—1988年煤炭电力两个部门累计总成基本建设投资54.49亿元，占全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额的36.83%。1988年全省一次生产能源总量（折标准燃料）达2483.4万吨，比1949年增长114.94倍，年均增长12.96%，完成工业产值162,518万元，占工业产值的12.88%。能源的发展为我省经济

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成为我省优势产业。但是，贵州能源生产不稳定。这同能源工业构成有关。1987年我省能源工业产值为144320万元，其中电力工业57875万元占40.1%，煤炭工业为2943万元占59.79%，石油工业151万元占0.01%。当年发电机装机容量208.6万千瓦，其中水电129.37万千瓦占62%，火电79.23万千瓦，占38%，贵州电网150万千瓦，其中水电86.9万千瓦占58%，火电63.1万千瓦占42%。电力构成中水电比重大，而水电要受水源、季节、库容等影响，年发电量起伏波动很大。1989年乌江，红枫湖面大水库来水量比前年减少三分之一，全年被迫发电达八个月之久。

贵州电力消耗呈上升趋势。这不但是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同贵州高能耗产业比重大、发展快有关。今后随着贵州矿产资源开发，高能耗的铝，铁合金，原料，磷化工等有较大发展，能耗必然更增大。再从支援邻省，缓解能源供需矛盾看，贵州应成为我国的能源基地。

从原材料供给看。我省生物资源和矿产资源非常丰富，加上同能源配合，完全有可能建成我国的原材料基地。1988年，我省主要原材料的产量是：钢33.17万吨，钢材23.13万吨，铁矿石83.13万吨，铁合金12.69万吨，生铁69.07万吨，磷矿石281.82万吨，铅85681吨，水泥293.38万吨，硫酸7.92万吨，烧碱14444吨，木材88万立方米。从供需情况看，大部分产品能满足本省需要并可外调，少部分有缺口。如1988年，钢材消费量564,367吨，缺口333,067吨，水泥消费量1,657,478吨，余1,276,322吨，木材消费量440,869立方米，余439,131立方米。

贵州机械电子工业有一定基础，特别是三线建设形成的军事工业有相当雄厚的技术设备力量和工程技术人员力量，应当将这一部分资源充分利用起来，根据市场需要，生产出适销对路的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的产品，为兴黔富民服务，不能使它们闲置。

二、抓住时机，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有效供给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治理整顿、深化改革，

“八五”、“九五”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是在保持社会经济稳定的基础上，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把治整，改革、发展给合起来，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这为贵州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

(一) 从治理整顿的任务看，全国既要压缩总需求，又要增加有效供给。从贵州来看，主要增加有效供给。把全国与贵州结合起来看，全国需要增加短缺的农业、能源、原材料，也正是贵州需要增加的。从贵州的资源状况出发把贵州建成支援西南，服务全国的能源，原材料基地不但是应该的而且是可能的。真的想要把能源、原材料搞上去就必须加快开发贵州。把贵州开发提上日程并尽快付诸实施，

(二) 从国家建设地区布局战略来看。“七五”时期国家经济发展地区布局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重点放在东部地区、资金、政策向东倾斜。实施的结果，促进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但带来三个明显的后果：一是东西部差距拉大，贵州更为突出；二是东部由于资源匮乏，缺乏后劲，而西部由于投资不足，资源不能有效开发，又缺乏后劲；三是基本上是以市场为导向，急功近利思想指导，产业结构趋同化，忽视地区特色。总起来的后果就是农业支撑不了整个国民经济，基础产业支撑不了加工工业，造成全国性比例失调，基础不稳。于是才不得不进行治理整顿，加强基础产业。而基础产业中能源同原材料又主要是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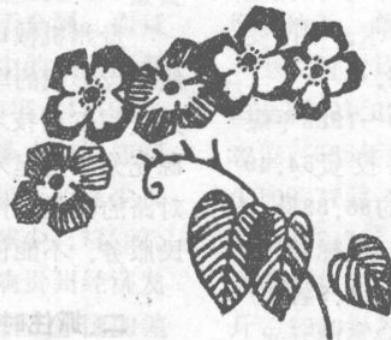
西部，而贵州又由其资源丰富，资源与能源匹配，位置适中，开发较易等特点，在国家考虑经济布局时，有可能重视贵州的开发，在资金、政策上也会给予一定的投入和优惠。让贵州的资源长埋既不利于贵州也不利于全国。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多作工作，引起中央的重视，吸引兄弟省市联合开发贵州。

(三) 认真作好产业结构的调整。

贵州产业结构调整的指导思想是：以增加有效供给为目标，以结构效益为核心，立足贵州开发，增强经济实力，逐步推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为兴黔富民服务、为实现贵州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服务。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要认真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1) 是从实际出发，建立具有贵州特色的产业结构，避免地区趋同化；(2) 产业结构调整要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运行机制作用下进行。(3) 产业结构调整要同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结合起来。(4) 产业结构调整要同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结合起来。

综上所述，贵州产业结构的模式是：以农业为基础，以能源原材料为主导，以机械、电子，轻工为支柱，相应发展第三产业的资源综合开发型的产业结构。

(作者工作单位：贵州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一九八九年货币流通分析及

建立货币调控总机制的设想

王惠英

一、一九八九年我省货币流通状况及成因
一九八九年，我省贯彻治理整顿经济方针取得成效。农业获得好收成，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农村货币流通量增幅下降，货币状况向好的方向转变。具体有以下特点：

1、农村现金投放大为减少。一九八九年全省农村现金收入48.28亿元，比上年减少1.40亿元，现金支出53.19亿元，减少3.4亿元，收支相抵投放货币4.9亿元，比上年减少2亿元，减少29.68%。主要收支渠道变化：一是农村信用投放减少9970万元；二是收购农副产品现金支出减少19624万元；三是商品销售回笼减少13016万元；四是储蓄回笼增加5000万元。

2、货币流通增幅大为下降。一九八九年我省农村货币量为26.22亿元，增长12.05%，比上年增幅下降39.80个百分点，剔除农村零售物价指数上升18.1%，货币量实际是减少。一九八九年我省农村社会总产值为177.16亿元，增长9.97%。其中，农业总产值为133.68亿元，增长4.8%，比上年多增2.5个百分点，工业、建筑、运输、商业产值为43.48亿元，增长10.87%。农民人均总收入为620.01元，增长12.1%，人均纯收入为430.34元，增长8.2%。货币状况与经济发展基本适应，反映了治理整顿经济的成效。

3、结构变化。农民持币量仍有上升，年末全省农民持币量为22.83亿元，比上年增长16.27%，单位库存现金为3.39亿元，下降8.99%，结构比例由上年的83.89：16.11变为87.07：12.93。

货币流通变化特点的成因：

1、紧缩信贷规模，调整信贷结构，发挥总闸门的作用。一九八九年在治理整顿方针的指引下，我省各级行贯彻紧缩信贷政策，农业银行和信用社对农村发放农业贷款8.23亿元，比上年减少3.88亿元，减少32.04%。银行农业贷款余额增长1.45亿元，比上年少增8485万元。同时，抓紧清收贷款，加速信贷资金周转，调整信贷投向结构，银行农业贷款中：乡镇企业贷款发放1.13亿元，收回1.08亿元，余额增长504万元，比上年少增7542万元。农户贷款发放，保证种养业的资金需要，种养业贷款占农户贷款的比例上升5.2个百分点，用于工商业的贷款压缩48.42%，比重相应下降。信贷机制有力地调节了货币投量和投向，全年农村信用现金收支相抵净投放减少9970万元，促进了货币状况的好转。

2、加强利率、结算、现金管理等调节手段。一九八九年国家调高存贷款利率，开展保值储蓄。我行加强结算账户管理，组织协助清理三角债，开展全省现金管理大检查，收回超库存限额现金一千多万元。到年末，全省农行集镇储蓄增长1.78亿元，集团单位存款增长1.38亿元，两项合计比上年多增1.28亿元，也促进了货币回笼。

3、农副产品收购支出减少。一九八九年，我省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为19.89亿元，比上年减少1亿元，银行农副产品收购现金支出减少1.9亿元，这是当年投放减少的最主要因素。

4、消费性支出增长减缓。全年全省工资性现金支出为10.25亿元，增长7.3%，比上年